

# 30年代的“最后一个浪漫派”

## ——历史与现实交汇点中的沈从文小说

陈 国 恩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陈国恩(1956-),男,浙江宁波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 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代表了30年代前期田园浪漫主义的成就。他综合了乡土小说和创造社、新月社一些作家的艺术特点,又横向吸收了外国文学的营养,形成了他自己优美抒情的田园牧歌风格。从他的成长过程,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发展演变轨迹、各种风格的彼此消长及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从他于左翼文学思潮的关系,可以探究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命运和历史地位。

**关键词** 沈从文 小说 综合 田园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 I 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1999)04-0078-05

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到20年代中期开始分化,逐渐趋向衰落。但它在低潮中探索新的方向。其中一脉细流是30年代初形成的田园浪漫主义,代表者是郁达夫、废名和沈从文。这是适应时代变化而从五四浪漫主义思潮的分化中蜕变出来的,较为接近西方以湖畔诗人为代表的优美抒情型的浪漫主义。在这少数的作家中,沈从文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自称是20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浪漫派”<sup>①</sup>,表示“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sup>②</sup>,借朴素优美的故事发泄自己作为一个乡下人长期受压抑的感情,描绘他理想中的优美的人生样式。他的创作体现了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在二三十年代之间的发展趋势,他的湘西小说代表了田园浪漫主义的典型形态。他从自己的主观条件出发,综合了“五四”乡土文学和创造社、新月社一些作家的艺术经验,把五四浪漫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的发展演变轨迹和各种风格的彼此消长。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创作与时代的要求存在着距离,与主潮文学构成了矛盾统一、共存互补的关系,由此给他带来的始则受冷遇终则被当成出土文物重见天光的经历,折射出一个浪漫主义者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以后难以避免的命运。总之,沈从文的创作从许多方面看,对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都具有象征的意义,可以当作浪漫主义思潮在30年代前期的一个典型来看待。

沈从文初涉文坛,正当创造社“异军突起”,郁达夫的浪漫抒情小说风行一时。他写道:“郁达夫在他作品中,提出的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名誉、金钱、女人取联盟样子,攻击我这零落孤独的人……’这一句话把年青人心说软了。”<sup>③</sup>“郁达夫那自白的坦白,仿佛给一切年青人一个好机会,这机会是用自己的文章,诉之于读者,使读者有‘同志’那样感觉。”<sup>④</sup>这充分道出了他对郁达夫的理解和仰慕之情。沈从文从小经历磨难,过早地告别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形成了他的偏于忧郁的气质。到北京后,又几乎陷于极端贫困之中。他的内在气质和现实感受使他在创作的起步阶段自然地靠近了名声鹊起的郁达夫,因而开始学着用郁达夫的自我表现的方法来宣泄内心的郁积,写出了《棉鞋》等作品。这些早期的作品笔调比较粗糙,但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以反讽的语调写自我在贫困中的狼狈处境,带点落魄才子的戏谑味道,很明显是摹仿郁达夫小说的。

但随着社会革命运动的高涨,郁达夫式的浪漫抒情小说所包含的个性解放精神与社会革命的原则有了矛盾,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对此,沈从文是有所感觉的:“现在的世评,于作者是不利的。时代方向掉了头,这是一个理由。”<sup>⑤</sup>虽然沈

从文囿于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从来不曾追赶潮头,可他也分明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不得不对此有所回应。更为重要的是,他不具备郁达夫那样强大的浪漫气质和才情;他是质朴的乡下人,与乡土保持着特殊的联系,因而他必须寻找更加切合自己创作个性、适应自己的生活积累而在某种程度上又能被变化了的时代所能容纳的风格。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所代表的乡土文学对他的影响就明显地增大了。

乡土文学滥觞于鲁迅的《故乡》和《社戏》,稍后便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文学流派。其作品对于拓展五四文学的题材,校正五四浪漫主义小说因过于注重表现内心的要求而失之空疏的缺点,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正如沈从文说的:“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sup>①</sup>。沈从文多次声明他受过鲁迅的影响:“鲁迅先生起始以乡村回忆做题材的小说正受广大读者欢迎,我的学习用笔,因之获得不少勇气和信心。”<sup>②</sup>以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对沈从文的影响,主要是在沈从文的创作个性还未形成时,把他从郁达夫式的自我表现的道路上拉到了他自己得天独厚的乡土题材的领域,在创作手法上也从乡土文学中得到了重要启示,即采用朴素的形式来表达个人富有诗意的情感和理想,从而使他获得了不少写作的“勇气和信心”。这种影响之所以发生,除了时代的因素外,还因为侨居北京的沈从文此刻有一份强烈的思乡之情,他对少年时代的乡土生活始终保持着生动的印象,并且坚守着作为一个乡下人所特有的审美和道德理想。他的一些最为精彩的作品,如《边城》《三三》《萧萧》《阿黑小史》《长河》等,几乎都是写乡土题材,也几乎都采用了这种朴素的写意手法。凭这些作品,他奠定了自己在30年代文坛的重要地位。

不过,沈从文是一个富有创造精神的作家。他不会满足于简单的模仿,而是要取众家之长进行创新。因此,他虽然借鉴了乡土文学的成功经验,可最终并没有真正走上乡土文学的创作道路。能够显示这种创新精神的一个例子,就是他虽受到鲁迅的影响,却无意追随鲁迅去反映农村的落后面貌和农民愚昧的精神状态;相反,他醉心于表现乡土的朴素与宁静,把它们当作美的极致,或者写一些美丽而忧伤的爱情故事来寄托他作为一个乡下人的灵魂的痛苦挣扎<sup>③</sup>。这说明他在突破了郁达夫的“自我表现”路子之后,在深层次上仍然保留了郁达夫的一点影响。简单地说,他只是去除了郁达夫浪漫小说中感伤和颓废的成分,而让“自我表现”采取了朴素的形式,或者干脆把它运用于神话传说的题材,给作品增添了浪漫的色彩(《龙朱》《神巫之爱》《豹子、媚金与那羊》等)。而在另一些作品中,如《雨后》《柏子》《丈夫》等,他又并不讳避性的描写,而只是把郁达夫式的自我暴露改造成对自然人性的生动展现,让大自然的清新气息净化了人物的肉欲冲动,凸现其心灵的纯朴。因此,可以说沈从文在追求属于自己的风格的最初努力中,乡土文学和郁达夫的影响是综合地起作用的。前者使他回归乡土,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早期由于学郁达夫而带来的感伤色彩和幼稚的名士气;后者使他得以坚

守自己的个性和审美理想,并且抵御着外界的要他在现实中消解自我、趋向平凡化的压力。两者相互作用,彼此克服了与作者的创作个性相抵触的因素,共同制约着沈从文选择一种综合了两者特点而又能够减轻迅猛变化的时代所加给的压力风格,那就是朴素优美、洋溢着诗情画意的田园牧歌。沈从文以此超越了郁达夫和乡土文学,以一种边缘人的立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走田园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当然,沈从文的借鉴超出了郁达夫和乡土文学的范围。在他的田园牧歌风格中,事实上还包含着徐志摩和废名的影响。徐志摩在浪漫主义思潮的生存空间渐趋狭小之时,充分发掘了文字的乐感,把一腔柔情熔铸在活泼而轻盈的形式中,展示了一个诗人感官的敏锐和感情的细腻,创造了一种典雅温婉的抒情风格。这种风格体现了对诗歌形式规范的自觉,它一方面纠正了新诗自五四以来因过分强调自由表现而渐趋散文化的倾向,另一方面因减弱了反社会的力度和其艺术上的精美在社会革命时代求得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沈从文是新月社的成员,对徐志摩怀着仰慕之情。他从徐志摩的创作经验中吸取有益的营养,是顺理成章的,就像他说的:“在写作上想到下笔的便利,是以‘我’为主,就官能感觉和印象温习来写随笔。或向内写心,或向外写物,或内外兼写,由心及物由物及心混成一片。方法上多变化,包含多,体裁上更不拘文格式可以取例作参考的,现代作家中,徐志摩作品似乎最相宜。”<sup>④</sup>他从徐志摩的作品中主要借鉴了以理节情的技巧,不让笔下放肆,力求把感情处置到和谐优美的形式中;同时还学习了在独处中细腻地感知对象的方法,即“就官能和印象温习来写随笔”。这两方面,使沈从文的创作在乡土的底色上越来越显出温柔细腻的特点。

废名形成个人风格的时间略早于沈从文。他用写诗的方法来写小说,在浪漫的想象中融入了晚唐绝句的意境,形成了简洁、充满诗意、清丽典雅的文体。他以这种方式确定了自己的艺术信仰,其实质就是通过把生活艺术化而为自己动荡的岁月寻一块安息灵魂的净土。沈从文由衷地称赞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枣》,有些短短篇章,写得实在好”。<sup>⑤</sup>他尤其欣赏废名小说中的诗意的抒情,承认自己的风格深受废名的影响,并认为描写上还做不到废名那样的简练:“自己有时常常觉得有两种笔调写文章,其一种,写乡下,则仿佛有与废名先生相似处。由自己说来,是受了废名先生的影响,但风致稍稍不同,因为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是只有废名先生才能那种经济的。”<sup>⑥</sup>沈从文向废名靠拢,是因为废名在退守社会边缘时所采取的艺术方向,对处身于动荡之中而又渴望心境宁静的沈从文产生了同样的吸引力。同时,他们的主要作品在题材上的相近也对彼此的风格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即乡土题材本身包含了一份诗意,而优美的风景、纯朴的民风、天真的少女,需要用一种与之相称、最能体现出它(她)们的恬淡诗美的风格去加以表现。沈从文受废名影响的结果,是在他的朴素的文字中,“蕴蓄了多少抒情诗气分”<sup>⑦</sup>。当然,废名的个性更为奇诡,他的诗性抒情趋向清静脱俗,不含人间烟火味;沈从文则比较宽厚,不避世俗之美,所以他的用笔

显得从容,诗的素质多了一份暖意。

其实,从郁达夫、徐志摩、废名到沈从文,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这一走向,体现了一个普遍的艺术规律,即艺术的发展是从直露到含蓄,从粗糙到精美。五四时代,郁达夫式的浪漫抒情小说为了加强反封建的力度,追求情感表达的真切自然,作者有意采用自我暴露的写法而在艺术上有时失之过于直露。直露,是时代的特点,毕竟不是艺术的优点。随着五四高潮的过去和创作经验的逐步积累,人们要求浪漫主义文学克服初创时期的弱点。这大致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形式上的改进,从随心所欲、不讲章法到注意结构,力求把情绪处置得符合美的规范;二是内容上扬弃过于直露的性心理的展示,使风格趋向含蓄蕴藉。徐志摩的诗追求优美的旋律,废名的小说融注了诗的因素,它们都趋向艺术上的精致含蓄,体现了文学发展的这一内在要求。沈从文自称要建造精致结实的希腊小庙,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的“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他的创作实践沿着这同一个方向,把五四浪漫抒情小说推向一个尊和谐为美的极致的田园牧歌的新阶段。

总之,沈从文置身于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转折时期,综合了从郁达夫到鲁迅,到乡土文学,再到徐志摩和废名等众家之长,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在他的不断追求和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中,显示了他锐意创新的自觉意识。他的成长道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时代风云的变幻和一个浪漫主义者所坚守的立场及其成败得失,可以从中透视各种文艺思潮的消长,尤其是看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如何逐渐退居边缘,蜕变出30年代田园牧歌型的浪漫主义的秘密,而代表后种类型浪漫主义的最高成就的正是沈从文。这使沈从文的创作道路从浪漫主义思潮的发展这方面看,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

## 二

新文学从20年代到30年代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从五四文学全方位的向外开放到30年代逐渐把重点转向苏俄文学,同时向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回归。这一方面反映了新文学作家在处理中外文学传统的关系时从五四文学的发展中吸取了经验,逐渐走向成熟;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保守势力的抬头,并且由于存在着片面地以观念的图解取代真切体验的情况,使一些作品的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主题未能与个人生动丰富的感性经验及真挚感情结合起来,未能用外国文学的营养来丰富本民族的文学传统,从而影响到它们的艺术成就。在这样的背景中,沈从文以宽容的心态,吸取中外文学的有益养分,自由创造,构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这方面的经验,既反映了文艺界整合中外文学传统的共同倾向,又显示了他个人的独特之处,是可以看作一个相当成功的例子的。

沈从文没有出国留学,他对外国文学的接受主要通过五四文学这一中介,因而具有间接性的特点。这使沈从文接受外国文学影响的范围不及先驱者广泛,但却能够站在先驱

者的肩膀上,进行中外文学传统的有效融合。

五四时期,人们向文学要求力量、粗暴和狂放,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在道德观和审美观上表现了彻底反传统的倾向。沈从文显然与此一脉相承。他的田园小说并不回避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他甚至说,“因为生存的枯寂和烦恼,我自觉写男女关系时仿佛比写其他文章还相宜。”<sup>⑧</sup>这除了反映他的乡下人观点外,显然还与他受郁达夫的影响有关,而其中所包含的正是郁达夫取自西方的现代人文主义的价值观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不过西方人文主义观念还有个人与环境相对抗的个性主义一面,落实到郁达夫小说,就表现为那种无所顾忌的自我暴露,这使郁达夫小说有时因失去分寸而不免显得过于露骨和颓废。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持泛性主义的立场,这也助长了郁达夫展现性苦闷的兴趣。随着时代的发展,郁达夫的这类描写日渐显露出局限性。有鉴与此,沈从文对男女关系的写法有所改变。如《雨后》,四狗和七妹子的姐姐在雨后斜阳的映照下,唱了一支生命历程中的青春小曲,这并不怎么惹眼,全由于大自然的单纯美化了年轻人的荒唐和近人情处。《采薇》《夫妇》,也莫不是用懒懒的阳光、和煦的春风把青年男女处置到忘情的境界里去,在那样一种自然怀抱中,他们不做一点傻事,似乎反而成了一种罪过。这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沈从文坚持自然人性的观点,把这些人当作自然的一部分来写,人与自然已融为一体了。他用大自然的光和空气冲淡肉的气息,提升灵的因素,重在展示“乡下人”的健康而朴素的人性。这也表明沈从文试图以当今的尺度重新协调中西文化的关系,使之朝着更富有民族特色然而又不失其现代性的方向发展。

这一方向,用沈从文的话说,就是“节制”、“恰当”、“匀称”、“和谐”。他说:“我懂得‘人’多了一些,懂得自己也多了一些。在‘偶然’之一过去所以自处的‘安全’方式上,我发现了节制的美丽。”<sup>⑨</sup>“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全篇分配要恰当。作品的成功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sup>⑩</sup>他的这种审美理想,与中国传统的尊“和谐”为美之极致的儒家诗教接近,与中国道家的顺应自然的理想相合,但显然也包含了古希腊美学的成分。沈从文写道:“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里供奉的是人性。”<sup>⑪</sup>他理想中的人性是用溪水、阳光、空气化育,带着泥土的气息,也许粗点野点,但朴素健康,一切循乎自然,这跟古希腊人的观念十分近似。而它的表现形式又是精致、结实、匀称,与古希腊的崇尚和谐匀称的审美理想也完全一致。

作为京派成员,沈从文主要是通过京派的重要理论家周作人接触古希腊美学的。周作人讲欧洲文明必上溯到希腊去,一再称誉古希腊文明讲究自由与节制相调和。他向往冲淡闲适,爱好天然,崇尚简素,喜欢平易宽阔,不喜欢艰深狭窄,尤其是憎恶做作,都可归结到他的希腊式的审美理想。他用“中庸”来解释这种人性观和审美观,并不断声明这根据的不是孔子三世孙所做的那部《中庸》,而是普通的人情物理,实质上是把他所理解的希腊文明用中国人易于理解的语言

表达出来。30年代的“京派”，包括沈从文，崇尚和谐、节制、均衡、稳定、明朗的美，其理论旗帜和精神领袖就是周作人。沈从文的高明处在于，他把这种审美理想与他个人气质、个人趣味结合起来，与题材本身的特点结合起来，“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慎慎重写最后一首抒情诗。”<sup>⑨</sup>代表作便是《边城》。《边城》写得优美、精致、和谐，符合古希腊的审美理想和道德理想，但更能见出中国的特点——它非立体的雕塑，而是写意的水墨长卷。那种淡泊的意蕴，灵动的笔调，水样的忧愁，温爱的氛围，表明作者把古希腊的理想成功地嫁接到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根上，复活在当下中国人的审美实践中了，中西文化的融合由此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向本民族传统回归的趋势之一是东方化。东方各国在历史上交往密切，彼此的文化有相近的一面，较之西方文化更容易相互交流。沈从文利用这一历史渊源，在整个民族收缩对外开放范围的背景下把兴趣转向印度佛教。他从佛经故事中选取题材，写成《月下小景》集这样别具一格的小说，让人“明白死去的故事，如何可以变成活的，简单的故事，又如何可以使它成为完全的。”<sup>⑩</sup>不过，《月下小景》虽取材于佛经，但说到底是把中国化的佛教经典加以现代化的改造。其中的循乎自然和知足常乐的思想，与其说是吸收外来文化，不如说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只是从中也能看出东方民族共同的人生态度和审美倾向罢了。

沈从文融合中外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成功经验，是执意打破“理论”、“指南”、“作法”之类的框框，不从先验的预设出发，而是依据表情达意的需要，只求择取的中外文学的观念、技巧、手法等与自己的心情谐和，与所表现的对象特点相称，允许感情到一切想象上去散步，就像他自己说的：“我除了用文字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sup>⑪</sup>他以此获得了自由的心境，创造了融中外文化于一炉的独特的“情调”，成为一个出色的“文体家”。

总之，沈从文依托五四文学的成就，在向传统回归的同时，以他独特的探索朝着西方文学的精髓处深入了，于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上实现了中西文化更深层次上的融合；他继承并且超越了五四文学，把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吸收外国文学营养、丰富民族新文学的内涵的工作推向了一个更自觉、更成熟的阶段。

### 三

沈从文处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蜕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上。他借鉴了前辈和同代作家的艺术经验，兼取中外文学之长，进行创造性的转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这同时也使他处于两难的境地——既不讨好当局，又受到左翼文艺界的批评。后者从革命的立场出发批评他不反映时代的风云，却去描写“抽象”的人性。这种遭遇其实代表了浪漫主义思潮在30年代的必然命运。

浪漫主义主张自我扩张，表现内心冲动，反对一切外加

的束缚。浪漫主义的理想，是对于遥远的美好前景的永不止歇的憧憬，是一种无边的理想主义，表现出来的就必然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彻底否定。浪漫主义的极端主情的性质，体现了浪漫主义者情感纤敏、意志薄弱的特点，这有利于创作，使文学因此增添了活力和色彩，却不利于作家面对冷酷的现实，用坚实的行动从黑暗中开辟一条光明的出路来。因此，当社会处于新旧交替时期，需要对僵化的文化传统进行打击，而社会压制暂时松动，为个人自由和主观精神的高扬提供了机会时，浪漫主义便获得了最为适宜的生长环境。一旦社会的发展转向重建某种明确的秩序，需要用集体的力量去共同奋斗，浪漫主义便难以充分发挥它的优势了，甚至它的优势反而成了新时代的异己因素。

中国进入20世纪后的社会特点是，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相互纠结在一起，思想革命与社会革命交替地进行。“五四”时期，思想启蒙是时代的主旋律，个性主义思想广为流布，促成了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迅猛崛起。可是启蒙运动不能直接完成其自身所提出的社会改造的根本任务，加上“五卅”以后反帝运动的再次高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整个时代潮流很快从思想启蒙转向了反帝反封建的社会革命。这一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浪漫主义思潮的生存环境。一方面，这场社会革命为它自身的目的、性质、任务和手段所规定，它必然要提倡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要求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反对个人的自由意志；号召为理想而奋斗，反对停留在充满诗意的憧憬和感伤主义的水平上。因此，如果有人简单从事，他必然要对包含了个性意识、自由意志、感伤情调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进行清算。郭沫若改变对浪漫主义的态度，以革命的名义，反对的就正是浪漫主义里面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而在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当局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压制思想言论和创作自由。这样，处于左右两大势力的夹缝中，以个性主义思想为基础的现代浪漫主义思潮的生存空间大为缩小，难现昔日的辉煌了。少数浪漫主义者只能退居人生边缘，力图超越政治斗争，以保持乃至扩大个人的心理自由，来坚持其浪漫主义的创作方向。这就使他们与左翼文学思潮处于一种十分复杂的关系中。他们反对思想束缚，追求个性自由，在反封建这一点上与左翼文学思潮有共同之处。但左翼文学思潮已经超越了“五四”，他们却不仅坚守“五四”的立场，而且与五四精神事实上也存在着重大差别，这便是五四精神兼顾了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要通过个性解放达到社会改造的目的，30年代的田园浪漫主义者的自由观，则是少数文化人在启蒙运动转向低潮、政治斗争日趋尖锐的形势下，对五四精神有所取舍，即削弱了它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只把它用作维护个人自由的手段，表现出了疏远时代的倾向，因而它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时代的局限性，与左翼文学思潮产生了重大的矛盾。

沈从文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中所选择的道路，是以“乡下人”自居，这在“最后的浪漫派”中具有代表性，也使他的作品带有隐逸性，难以得到主流意识的认同。但在30年代，个性解放的任务事实上还没有完成，而只是被更为紧迫

的社会革命的任务暂时所掩盖罢了。沈从文退居社会的边缘,专去描写边地的纯朴民风,宁静的自然风光,这种隐逸性事实上也是基于个性主义的立场,对黑暗现实发出的一种抗议,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因而,它在深层意义上与左翼文学思潮并不完全对立,而是一种矛盾互补的关系。这就是说,他以自己对人性的探索,自然美和风俗民情的生动表现,与左翼文学的重大题材相映成趣,拓展了新文学的艺术表现的领域。他以一种比较宽泛的正义立场和美的标准憧憬未来,虽不是战斗的号角,却是能够净化人的心灵的一曲悠扬牧笛。这方面他所取得的经验有助于人们反鉴部分左翼作品艺术上比较粗糙的缺陷;而左翼文学在展现广阔的生活画面、提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参与历史进程等方面所显示的气魄和取得的成就,同样可以作为一面镜子,反映出他的作品时代气息不浓、艺术格局偏于狭小的不足。他致力于探讨民族品德的重造,表达了回归自然的理想。“自然”既是道德极致,又是精神家园,这在当时社会革命的时代显得不合时宜,带有书生气和浪漫性,然而从更长远的眼光看,它也是符合人类的终极意愿和根本利益的,因而事实上又与左翼文学所代表的社会革命的根本目标相一致。沈从文以他乡下人的固执,专注于人性的改善和美的发现,这一努力使他的作品在相当长时期里受到具有历史使命感的读者的批评,但又为它们的价值在经历了革命斗争年代的冷落后,到了重新肯定人性和美的应有地位的新时期再次被发现奠定了基础,埋下了伏笔。

注 释:

- ①②⑩⑪ 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第294、273、287、294页。  
③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

172页。

- ④⑤ 沈从文:《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139、140页。  
⑥ 沈从文:《学鲁迅》,《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233页。  
⑦ 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69页。  
⑧ 沈从文在城市题材的小说中倒是贯彻了启蒙的主题——对“城里人”的种种劣根性加以无情的抨击。这可以认为是鲁迅为代表的乡土文学对他创作的另一个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的结果却是使沈从文的创作逸出了浪漫主义的轨道,趋向现实主义。  
⑨ 沈从文:《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211页。  
⑩ 沈从文:《由冰心到废名》,《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231页。  
⑪ 沈从文:《夫妇·附记》,《沈从文文集》第8卷,第393页。  
⑫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文集》第7卷,第3页。  
⑬ 沈从文:《一个母亲·序》,《沈从文文集》第5卷,第2页。  
⑭ 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14页。  
⑮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42页。  
⑯⑰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45、42页。  
⑱ 沈从文:《月下小景·题记》,《沈从文文集》第5卷,第42页。

(责任编辑 吕 慎)

## Last Romantic School in 1930s

Chen Guoen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uthor** Chen Guoen(1956-), male, Doctor,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West-Hunan fiction by Shen Congwen represents the achievement of pastoral romanticism in the early 1930s. He forms his own gracefully lyric style of pastoral by synthesizing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local fiction, chuang-zhao-she, and xin-yue-she writers, and by absorbing the nourishment of foreign literature. From his growth, we may see the trace of Chinese modern romanticism in its development, of various styles in their growth and decline and the background deep seated. From his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ft-Wing literary thoughts, we may probe into the fate and historical position of modern romanticism in China.

**Keywords** Shen Congwen; fiction; synthesize; pastoral romanticism